



M&C

媒介与文明译丛  
Media and Civilization

丛书主编 唐海江

# 纸知识

关于文档的媒介历史

Paper Knowledge:

Toward a Media History of Documents

[美] 丽莎·吉特尔曼 著

王昀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M&C

媒介与文明译丛  
Media and Civilization

丛书主编 唐海江

# 纸知识

关于文档的媒介历史

Paper Knowledge:  
Toward a Media History of Documents

[美]丽莎·吉特尔曼 著

王昀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知识:关于文档的媒介历史/(美)丽莎·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著;王昀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7

(媒介与文明译丛/唐海江主编)

书名原文:Paper Knowledge: Toward a Media History of Documents

ISBN 978-7-309-15044-5

I. ①纸… II. ①丽… ②王… III. ①文档-传播媒介-历史 IV. ①G254.92 ②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77505号

PAPER KNOWLEDGE, by Lisa Gitelman

© 2014 by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20 by Fudan University Press Co., Ltd.

本书原版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9-368 号

## 纸知识:关于文档的媒介历史

(美)丽莎·吉特尔曼(Lisa Gitelman) 著

王 昀 译

责任编辑/朱安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 86-21-65104505

外埠邮购: 86-21-65642846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38 千

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5044-5/G·2115

定价: 50.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克劳迪娅·S. 吉特尔曼

## 总序

百余年前,被誉为“舆论界之骄子”的梁启超,面对由新报和新知涌入而引发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变局,发出了“中国千年未遇之剧变”的感叹。相较之下,百余年后的今天,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给国人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的冲击,与梁启超时代相比又岂能同日而语?追问当下,目前公众、政府和科学工作者热议的人工智能和5G技术,以及可以想见的日新月异的技术迭代,又会将我们及我们的后代抛到何种境遇?于是,一系列新名词、新概念蜂拥而来:后真相、后人类、后人文……我们似乎比以往都更加直面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而又反复回响的命题:我们是谁?

面对这一疑虑,“媒介与文明”译丛正式与大家见面了。关于媒介研究的译著,在中文世界目前已是不少,一方面与上述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学术界“媒介转向”的潮流相呼应。但遗憾的是,有关历史和文明维度的媒介研究的译著却屈指可数,且不少译著以既定学科视野对作品加以分类,这不仅严重限制了媒介研究本应有的阐释力,也极大削弱了对当下世界变化的纵深理解和想象力,难免给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本译丛旨在打破当下有关媒介研究的知识际遇,提供历史与当下、中国与西方的跨时空对话,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回应现实。借此,读者可以从媒介的视野重新打量人类文明和历史,并对人类文明的演变形成新知识、新判断和新洞见。

在此,有必要对译丛主题稍作解释。何谓“媒介”?这是国内媒介学者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反映出中国缺乏媒介研究的学术传统,“媒介”给人以游垠无根之感,同时也因近年

来西方研究中的媒介概念纷至沓来，“变体”多多，有点让人无所适从。实际上，媒介概念在西方世界也非历史悠长。直到 19 世纪后期随着新技术的推动，“媒介”才从艺术概念体系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的常规词。此后，随着媒介研究的扩展，其概念也在不断演化和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们用媒介概念重新打量过往的历史（包括媒介概念缺席的历史），孕育和催生出诸多优秀成果，甚至形塑了各具特色、风格迥异的话语体系或者“学派”，为国人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

鉴于此，本译丛对于“媒介”的使用和理解并非拘泥于某种既定的、单一的意义，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视野，一种总体的研究取向，一种方法论的实施，以此解析人类文明的过往、当下和未来。也就是说，媒介在此不仅仅是作为既有学科门类所关注的具体对象，而是试图跨过学科壁垒，探讨媒介和技术如何形塑和改变知识与信息、时间与空间、主体与身体、战争与死亡、感知与审美等人类文明史上的核心主题和操作实践。

基于以上考虑，本译丛初步定位为：

- 一、题材偏向历史和文明的纵深维度；
- 二、以媒介为视野，不拘泥于媒介的单一定义；
- 三、研究具有范例性和前沿性价值。

翻译就是一种对话，既是中西对话，可以从媒介视野生发有关中国的问题域，同时也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正如本译丛所呈现的，倘若诸如主体性、时间性、空间性、审美体验、知识变革等议题，借助历史的追问和梳理，可以为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和中国文明的走向提供某种智识和启迪，那么，译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补充一句，译丛并不主张以规模、阵势取胜，而是希望精挑细译一些有价值、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成熟一部，推出一部。由于编者视野有限，希望各方专家推荐优秀作品，以充实这一译丛。

最后，译丛的推出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各位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也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各位工作人员对这一“偏冷”题材的厚爱。同时，尤其要感谢丛书的译者。在当今的学术市场上，译书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大家因为对于新知的兴趣走到了一起。嚶嚶其鸣，以求友声，也期待更多的同道投入到这一领域。

是为序。

唐海江

2018 年 12 月

## 中译本序

在写作此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有人前来问询，我都会告诉他们，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纸”——中国最杰出的发明。不过，当开始看到这些章节初步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关于文档的作品。当然，这两个主题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关于纸张的经验和使用纸张的方式，或者说，至少我们过去经常使用纸张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凭借直觉了解什么是文档，以及它们如何运作。诚然如此，即便我们能够想象除了纸以外的物质所做成的文档——也许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也可以想到许多由纸制成但并不是文档的东西。

某次，杜克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要我决定一个书名，我明白自己不得不同时将“纸”和“文档”两个词都放进去。但是，还有什么别的词吗？为了提高书籍的销量，即使是学术出版商也会对书名颇为挑剔。虽然我在本书讲述的媒介历史主要牵涉文档的复制方式，即在过去 150 年里，那些文档被机械化复制以供流通——通过打印、油印、影印等。但无论我如何尝试，都无法找出包含“复制”一词的合理书名。最后，我偶然想到了现在的标题，并且知道它会是适用的。应当向中译本的读者们解释的是，“纸知识”在英文中有双关之意。说到“纸知识”，听起来有点儿像是在说“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后者是哲学家福柯所说的“le savoir pouvoir”通常被译作的英文形式(《权力/知识》也是一本有关福柯采访录的书名)。不论读者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对我而言，“纸知识”这一标题部分意义上是对福柯的致敬，部分意义上则是一种“空耳”(mondegreen, 指的

是人们滑稽地听错了一首歌曲的歌词)。在本书的篇章中,福柯并没有明确出现,但他的精神却令其生动起来,因为文档是权力和知识交织在一起的工具。那么,文档复制是如何参与其中的?嗯,这就是我认为事情开始变得有趣的地方。

本书提供了美国媒介历史中的不同片段,我希望我的这种偏狭能够被谅解。对美国以外的读者来说,他们将比我更能了解自己语境中有关文档的媒介历史。最近,夏洛琳·福勒(Caroline Fowler)的《纸的艺术》(*The Art of Paper*, 耶鲁大学出版社,2019年)也让我再次意识到,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中,纸本身的意义有多么截然不同。我多么希望在写作《纸知识》的时候,手边能有福勒的这本书。同样,面对莫妮卡·多曼(Monika Dommann)的《作者与器具》(*Authors and Apparatus*,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9年)、洛伦·达斯頓(Lorraine Daston)的《档案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Archives*,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及2014年以来我乐在其中的许多其他著作,我的感受亦是如此。这些作品持续不断地形塑了我对纸知识的思考。

丽莎·吉特尔曼

于泽西市

2020年3月

## 前 言

死亡证明是严肃的文档，它们看起来是如此正式。至少在纽约市，每一份死亡证明都证实着自己的真实性，说明其“是文件记录的真实副本”。每份证明书上都印有一串号码，一位医生和一位市政官员的签名，两枚印章落款，一个条形码以及多个被仔细填写的方框。方框里的内容被精心制作，包含关于具体的已故者、死亡和遗体处理的详细信息。所有死亡证明书的背面都是空白的，或者说应该是空白的，除了涉及一张具有防伪功能的列表用来打消你的疑虑，以保证这份带有真实性声明的文档是可靠的。证明书上的印章和镶边都用了凹纹印花（可以把你的手指放在上面检查一下）；底部有缩影刻印（拿起靠近观察或使用放大镜）；纸张上有精细的水印（拿起来抬至一臂高度背光观察）；还有用热变色油墨印上去的标识（用手指快速地在上面摩擦，温度的上升会使其颜色产生变化）。如果一个人不怎么懂得“读”死亡证明，他看它的时候就会看起来像在表演健美操——时而用手将其伸出，时而将其端起靠近，时而把它朝一边翻转，时而又用手指触摸另一位置。

死亡证明看着是正式的，不过，这种看起来的正式感是一种很苛刻的要求，并且还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今天，死亡证明书里防伪特征的形式之复杂性呈现了纽约市对仿造品和佯装死亡事件的担忧。各种生产和复制技术的使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概括为“印刷”——意味着一场“军备竞赛”，一场在不择手段的佯死当事者和市政官员以及他们的合约商与代理人之间进行的持续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又牵涉不断发展、更为错综复杂的书写经济，某种程度上这一书写经济今时今日演

变为以数字工具和所谓的产销电子工业为特征。“书写经济”(scriptural economy)一词数十年前由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创造,用以指涉他称之为“无尽脉络”的写作。同时,他也将写作视为一种规训与神话——规训是因为写作是一种社会化和控制的形式,而神话是因为写作总是随着历史本身的厚度而积累<sup>1</sup>。

我在此使用这一措辞是想指代一种涵盖作者、作品以及在19世纪突飞猛进发展的写作技术的总体概念。这是一个动态的总体,由于当代学科构建和分类自身的方式,它通常并未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文学的发展、印刷方式的传播和新媒介的广泛使用不仅提升了有关19世纪写作和作品——书写方法(“-graphy”)和图形主义——的复杂经验,新的生产设备和文字复制手段以及包含声音、图像和其他各种方式在内的刻印媒介的最终使用也重塑了印刷业的专业化劳动和印刷品样式。

本书的展开围绕书写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选择性的特定时刻。这些时刻之所以重要,并非全然因为它们与技术革新相关联,更重要的是,这些技术革新获得了不断扩大以及正在扩大的社会支持。尽管支配书写经济的条件总是被用以满足官僚圈子的利益,但它自身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人类表达领域。德塞图曾一直试图在他所比喻的“无尽脉络”中寻找分离而出的线索,这些线索或可让他称之为“普通人”<sup>2</sup>的无名英雄得以发声。时至今日,这项事业依然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若用不同术语来描述的话,这项事业仍然首先有赖于针对近现代书写经济进行深刻的历史回顾,有赖于纠正性地超越一般的泛泛比较。这种比较过去常常被用来描述所谓的“古腾堡革命”(Gutenberg revolution)或互联网革命。而本书则朝着这个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绪论后面展开的四个章节,乃是在过去我和同事们的对话中发展而来的。这些对话不那么正式,是一个长久以来进行的开放化的同行评议过程,包括会议演讲、特邀报告、热烈的交谈以及针对草稿进行评论的电子邮件往来等形式。

第一章的核心内容依据在罗德岛大学的一场演讲写成。当时我受到卡罗琳·贝滕斯基(Carolyn Betensky)和她同事们的邀请。后来我被德斯皮娜·卡库达基(Despina Kakoudaki)、埃里克·达塞尔(Erik Dussere)及其同事邀请前往美利坚大学进行演讲时,对内容进行了修改。同时,这一内容也分别在由肖恩·库比特(Sean Cubitt)等人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主持的“生之回响”(Re: Live)会议,由莉雅·普莱斯(Leah Price)和安·布莱尔(Ann Blair)在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以及受邀于杰西卡·普雷斯曼(Jessica Pressman)

和迈克尔·华纳(Michael Warner)在耶鲁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得到展示。另外,多亏了本·卡夫卡(Ben Kafka)、达纳·波兰(Dana Polan)、迈克尔·温希普(Michael Winship)以及其他诸多人士的阅读,还有与玛丽·珀薇(Mary Poovey)针对书中涉及的交换功能的及时交流,我才得以进一步提升本章内容。

第二章始于里克·普瑞林格(Rick Prelinger)向我介绍罗伯特·宾克利(Robert C. Binkley)的《文人新工具》(New Tools for Men of Letters)一文。这一章的内容受益于将我带向文本研究协会的一系列演讲和指教,它们来自麦吉尔大学艺术史与传播研究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信息科学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英语系,斯坦福大学的科学与信息研究项目,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社会艺术中心,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材料文本研讨班,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英语系。当时在现场的慷慨的主持人和对话者有马修·科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约翰娜·德鲁克(Johanna Drucker)、丽塔·雷利(Rita Raley)、艾伦·刘(Alan Liu)、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保罗·艾斯(Paul K. Eiss)、杰米·斯凯·比安科(Jamie “Skye” Bianco)、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和杰瑞德·加德纳(Jared Gardner)。与此同时,本章的形成也得益于玛丽·莫瑞尔(Mary Murrell)、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Kathleen Fitzpatrick)、劳拉·赫尔顿(Laura Helton)和布莱恩·墨菲(Brian Murphy)的细致阅读和指正。

第三章的缘起由来已久。它作为会议论文曾宣读于人文、艺术、科学与技术发展合作实验室(HASTAC)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然后,在作者、阅读与出版史协会在明尼阿波利斯举办的会议当中,它也出现在其中一次热闹的(真的,的确如此)小组座谈里。这篇文章后来在马里兰人文技术研究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哈佛大学历史科学系被陆续扩充、修改和报告。尽管在剑桥市的停留颇为短暂,但与斯蒂芬妮·艾希(Stephanie Athey)、吉米娜·卡纳莱斯(Jimena Canales)和克雷格·罗伯逊(Craig Robertson)等人的交流极大地充实了我的此次经历。

第四章的形成始于在纽约大学英文系的一次工作谈话和在德州农工大学格拉斯卡克中心发表的一场演讲,当时我受艾瑞克·罗森布勒(Eric Rothenbuhler)的邀请参加了这场由詹姆斯·罗森海姆(James Rosenheim)主持的活动。杜克大学约翰·霍普·富兰克林人文研究所令该演讲得到了更多关注。艾伦·加维(Ellen Garvey)和他的研讨会同仁邀请我去那里,在斯里尼瓦·阿拉瓦穆旦(Srinivas Aravamudan)的主持下,我的演讲内容得到埃里克斯·希萨(Alex Csiszar)的认真评阅。此外,约翰·维林斯基(John Willinsky)、艾琳娜·雷兹洛格瓦(Elena Razlogova)和卡琳·温(Carlin Wing)等人的讨论同样

让人受益匪浅。一路下来，我尝试去弄清楚是什么支撑着关于上述章节的想法一起出现。在应桑德拉·加布里埃尔(Sandra Gabriele)之邀参加加拿大传播协会活动的时候，以及受印第安纳大学英语系邀请参加由乔纳森·埃尔默(Jonathan Elmer)主持的演讲时，我一一报告了其中的进展。另外，在康考迪亚大学[应达伦·维舍勒(Darren Wershler)和詹森·卡姆雷特(Jason Camlot)邀请]和德克萨斯文学文本研究所[受马特·科恩(Matt Cohen)的邀请]的报告也促进了我对自己想法的整理——就像在所有这样的会议上一样——很可能同时也帮助我收集了其他人的相关思想。对于上述和其他会议的主持者，共同参加小组讨论的人、读者、对话人、评阅人和活动赞助人，我始终心怀感谢。抱歉我无法道出你们所有人的姓名，也无法明确描述你们如此丰富的想法对我产生了多么细微和有趣的影响。

本书绪论得到安迪·帕克(Andy Parker)、玛瑞塔·特肯(Marita Sturken)、达娜·波兰(Dana Polan)、詹妮·杰克森(Jennie Jackson)和瑞塔·雷莉(Rita Raley)的评阅帮助。我的后记是断断续续地完成的，其中多亏了劳拉·科恩(Lara Cohen)的鼓励以及曾在伯克利、芝加哥纽贝里图书馆、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接触的听众们。对于大卫·贝茨(David Bates)和伯克利新媒体中心、保罗·格尔(Paul Gehl)和卡克斯顿俱乐部、卡罗琳·米勒(Carolyn Miller)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传播·修辞·数字媒体项目，还有麦迪逊分校人文学中心的玛丽·莫瑞尔(Mary Murrell)和印刷与数字文化历史研究中心的乔纳森·森奇尼(Jonathan Senchyne)发出的邀约，我一直抱有感激之心。我要特别感谢宽容而又聪明的匿名评审们，他们受杜克大学出版社所托阅读了整部文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可能还“偷取”了一点思想。另外，这项研究还得到许多难以估量的支持，既有智力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它们来自朋友和同事组成的核心群体，其中许多人的名字已经在上述被列出了。乔纳森·斯特恩(Jonathan Sterne)和梅雷迪思·麦吉尔(Meredith McGill)是非常棒的支持者、合作者、朋友和对话者，并且，如果没有帕特里夏·克莱恩(Patricia Crain)、安迪·帕克(Andy Parker)、珍妮·杰克逊(Jennie Jackson)、马丁·哈里斯(Martin Harries)、盖尔·沃尔德(Gayle Wald)、卡罗琳·贝腾斯基(Carolyn Betensky)、丽莎·林奇(Lisa Lynch)、斯蒂芬妮·阿西(Stephanie Athey)、瑞塔·雷莉(Rita Raley)和特里·柯林斯(Terry Collins)，我所进行的思考也不会如它现有的这样有趣和有用。我的姐妹希拉里(Hillary)和阿利克斯(Alix)能够理解在本书准备过程中我针对死亡证明书所作的一切工作，我对她们永远充满感激与爱。

绪论中的几段话和第一章的一些观点曾作为《印刷文化(抄本除外): 业务印刷及其重要性》[Print Culture (Other Than Codex): Job Printing and Its Importance]一文的一部分,收录在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和杰西卡·普雷斯曼(Jessica Pressman)编著的《比较文本媒介》(*Comparative Textual Media*)一书当中(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sup>①</sup>。

第三章第一部分的早期版本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与关于影印的失败想法》(Daniel Ellsberg and the Lost Idea of the Photocopy)一文的形式,收录于由劳特里奇出版社2011年出版,安德斯·埃克斯特罗姆(Anders Ekström)、索尔维格·朱里奇(Solveig Jülich)、弗兰斯·伦德格伦(Frans Lundgren)和佩尔·威塞尔格伦(Per Wisselgren)编著的《参与式媒介的历史: 政治与公众 1750—2000》(*The History of Participatory Media: Politics and Publics, 1750—2000*)一书中。这些出版作品和本书之间相互重叠的内容均已经过许可,在它们发表过程中得到的编辑建议让我受益良多,就如同最近我从肯·威索克(Ken Wissoker)、考特尼·伯格(Courtney Berger)和杜克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那里收获的专业意见一样。2012年在麦吉尔大学的“媒介@麦吉尔”中心做比弗布鲁克访问学者,2011年至2012年在纽约大学人文创新项目当研究员的经历,使我在筹备本书的过程中获得了及时的研究资助。纽约大学斯坦哈特学院帮助支付了本书的插图费用。2007年夏天,美国文物学会提供了一项短期资助,令我得以从事一些不一样的研究,当时我首次接触了一份源自奥斯卡·哈佩尔(Oscar Harpel)那古怪印刷术的副本,因而在此一如既往地对美国文物学会致以感谢。

---

<sup>①</sup> 本书翻译时,该书已于2013年出版。——译者注。

# 目 录

前言 / 1

绪论 纸知识 / 1

第一章 一段关于\_\_\_\_\_的简短历史 / 17

第二章 打字稿图书 / 44

第三章 心灵的静电印刷师 / 70

第四章 近乎印刷,超越纸质:以“. pdf”为视角 / 95

结语 业余爱好者闯入 / 116

注释 / 130

参考文献 / 167

索引 / 184

译后记 / 192

## 绪论 纸知识

文档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日常类型(genre),形式丰富而又无所不在。我们了解它是通过多元的子类型来实现的,包括备忘录、绿卡、本票以及广义上的同类物(如纪实材料和文献记录)。本书选择了媒介历史上的四种文档类型进行探究,每个章节均涉及不同的用于文档复制的媒介。要知道,“复制”是界定文档的一种明确方式:人们处理文档的其中一种方式便是复制它们,无论它们是否以不同的版本形式被出版(比如《独立宣言》);或是被复印作为参考证明(比如我带在行李箱中的护照影印件);或是内部流通的半出版品(比如餐馆的菜单);或是线上的传播数据(比如维基解密中的镜像与缓存文档)。

尽管复制表现的功能之一在于使人们得以将文档视作文档,就像我希望在后续作出的详细说明一样,但文档这一类型的核心功能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文档“document”一词源于拉丁语词根“docer”,意为讲授或展示,这表明文档是为了记载而存在的。避开术语本身存在的循环定义,有人也许会说,相反,文档和这种“认识-展示”功能是相互定义的关系,因为文档是一种认知实践,一种与展示紧密相连的认知,然后又用这种认知来展示自己。文档是认知对象,它们是可识别的现场,是跨越学科的主体解释,是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的证据结构<sup>1</sup>。与认识-展示功能密切相关的则是一种并不用于“秀出来”的作品,文档之所以成为文档,有时候仅仅是因为它们具备了被展示的潜力——它们被标记与归档只是为了未来以防万一的需求。认识或展示与否,取决于其隐含的自明性,它在本质上具有修辞色彩。正如约翰·纪洛里(John Guillory)指出的:“‘展示’意味着说服。”<sup>2</sup>如果说所有文档都共有某种特定“期望的视野”,那么这种视野的指定则带有其自身的解释性<sup>3</sup>。

简单地说一下类型。就我理解,类型是一种在话语中具现化的识别模式。例如,写作类型有赖于无限多的内容,这些内容让许多人得以识别、能够识别或

者已经识别作品为何而创作，即文档用于被认识与被展示。相比之下，教科书上一直认为类型取决于要素或者形式上的问题，比如十四行诗有十四行词句，喜剧乃是以婚姻为落幕，而悲剧的结局则是死亡。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呼吁从不同的视角去关注认知的集体性、自发性和动态性<sup>4</sup>。作为类比，想一想单词搜索，报纸上有时会出现印在填字游戏旁的铅笔猜谜。在单词搜索过程中，你的任务是识别和圈出平面格子中的随机字母。你能够识别不同的单词，因为单词拥有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你知道如何去理解它们。换言之，文字并不只是躺在书页里等待，它们同样已经在你的身体里，成为你学习（和被教育）与身边人打交道的方式的一部分。同样的类型如玩笑、小说、文档和情景喜剧从一系列话语中被对比式地挑选出来，它们常常是多媒介化的，因为其已经被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内化了。那么，单独的类型就不是人为的，它们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表达与接受实践，通过无数多变的、在当下以及跨越时空的实例而被人们识别。它们是特定的、动态的，是社会意识的现场，是话语场域当中具有一致性的部分。

不过，究竟什么是文档呢？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书志学家和其他信息专家一直苦苦思索这一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法国图书管理员和“文献专家”苏珊娜·布赖特(Suzanne Briet)在1951年提出的，野生羚羊不会是一份文档，但被带进动物园的羚羊则是，这很可能是因为它将被赋予某种框架或者说被重构，比如成为样本或者实例<sup>5</sup>。就像迈克尔·巴克兰(Michael Buckland)解释的那样，她当时以这样一个独特案例令人们关注到文档的属性：它们是被有意识地作为依据，以及正因如此而被处理或者框架化——如果不是一直被封存的话——的物质对象<sup>6</sup>。虽然我认为对“羚羊说”保持一种不可知论的态度可能是最好的，但布赖特和巴克兰的说法有助于强调文档认识-展示功能的语境依赖特征。任何对象都会是某种事物，但只要它被框架化或者作为依据，一旦它被动员起来，它就会成为文档，一种适合于自身类型的实例。值得注意的是，被布赖特那不同寻常的例子遮蔽的是，类型和“物”(the thing)能够呈现并且在过去数个世纪曾经呈现出多么复杂和纠葛的面貌<sup>7</sup>。

一般来说，写作类型常常被视为等同于一些文本制品，或者说成为一些文本制品的延伸，这些文本习惯性地将它们具现化。这就是媒介和格式发挥作用之处。比如“小说”这个词，你的听众们很可能会把它想象成一本印刷出来的书，即便小说在19世纪时也以连载的方式存在，以三层结构(多卷)的形式发行，现在也会被加载到Kindle、Nook和iPad中并被这些产品的设计者和用户重新想象。并非所有写作类型都面临着同样程度的困惑(比如“短篇小说”)，但是文档往往是一种漫长且变化的传统的传承物。它总是涉及表达材料形式与其自身语义的

纠葛,或者简单来说,令人不能完全区分两个具有困惑性的概念,即“文本”和“作品”<sup>8</sup>。所以票券、收据、名片在指向事物的同时,它们也是文档的子类型;它们是在一系列话语当中得以被识别的表达与接受模式,但它们也是通过不同方式被处理——反复展示和保存的平常实物。当谈及文档时,应当明白的一件事是,鉴于纸张的可供性以及其定义的文档已经无法从另一文档中分离出来的功能,在纸张被广泛应用的诸多世纪里,不论是在匮乏、充足或过剩条件下,由纸制成、带有符号印记不仅仅是文档最为典型的情形,也是最为显著的情形<sup>9</sup>。

虽然纸的工作原理被公认为是复杂甚至矛盾的,但是纸的使用方式已成为文档的一部分,反之亦然。试想一下,纸作为一种形式,对所有人来说可以是坚固而稳定的(比如,“让我们把它写在纸上!”),也可以是脆弱而短暂的(包括纸老虎和纸牌屋)<sup>10</sup>。同样,纸经常性地成为表达事物明确性和写实性的舞台——白纸黑字,同时,它本质上也是抽象和理论的促成者,比如数学和理论物理<sup>11</sup>。纸对所有人而言是思想的外在形式——纸上的世界,一切对它都是合适的,因为它是一块白板。类似这样的矛盾暗示的复杂性在于,文档可能以纸质物呈现,与此同时,数字产品通过额外的、有意思的方式(究竟什么是数字物性?<sup>12</sup>)诚然有助于动摇许多上述提及的一般性。即便如此,文档的类型和那些它在纸上附着的以及它自身作为纸的生命力,对数字媒介的设计者和用户而言都同样至关重要。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消极的,比如通过建构无纸化办公的神话;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积极的<sup>13</sup>,比如,想想在每台个人电脑上的“我的文档”文件夹,或者苹果电脑上的“文档”文件夹。电子客票(e-ticket)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种今时今日多样化地出现在屏幕上并被人们熟悉的文档子类型——被购买和销售、被上传和下载、被发送和保存、被认识和展示。

我应该声明的是,文档之所以重要并非因为它们无所不在,而是因为它们与人们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密不可分。认识-展示功能所体现的知识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并且,文档的属性还产生了各种形式的深远影响。正如杰弗里·能伯格(Geoffrey Nunberg)的描述,当前信息被理解为分散的“小块”或碎片,部分乃是由于信息的概念具象化了纸质文档的属性;它们是分离的以及可分离的,被划定边界以及被区分化的。与之相同,信息之所以拥有客观、自主的特征,部分取决于它反映文档归属的权威机构和实践方式<sup>14</sup>。这种对权威的反映揭示的是——有趣的是,不同于信息——文档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它们与特定的背景紧密相关。此外,认识-展示功能在时空中是具有语境依赖的,想想被困在动物园里的可怜羚羊;或者想一下在美国废奴运动史上的一份重要文档——1839年的《美国奴隶制现状》(*American Slavery as It Is*)。这份部分源自南方报纸的文档,